

【文学】

DOI: 10.15986/j.1008-7192.2016.06.015

论肖邦短篇小说女性意识的矛盾性

李新梅¹, 张谡过²

(1. 西安外国语大学 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 陕西 西安 710061;

2. 西安外国语大学 基础教学部, 陕西 西安 710128)

摘要: 美国作家凯特·肖邦因大胆书写女性觉醒意识的作品, 被公认为19世纪女权主义的先驱。分析肖邦短篇小说中女性的命运与结局, 可以看出, 肖邦作品的女性意识具有一定的矛盾性: 她们常常在觉醒意识和传统意识中犹疑, 选择的阶段性命运和最终命运往往大相径庭。通过分析《黛西蕾的婴孩》、《阿泰娜依斯》、《暴风雨》等七部短篇小说中的三类女性人物: 以死亡为结局的女人, 曾经觉醒但最终回归传统婚姻的女人, 体验和准备尝试婚外情的女人, 充分论证肖邦短篇小说中女性意识的矛盾性。而小说中女性人物的矛盾性深受作者肖邦本人的血统、独特个性、女权运动思想以及写作习惯的影响。另外, 被冠以女性主义作家的肖邦在某些长期以来被认为进步的作品中隐藏着种族主义和父权主义的观点。

关键词: 凯特·肖邦; 女性意识; 矛盾性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6)06-0077-05

一、引言

21 世纪, 国内外对美国作家凯特·肖邦(1851—1904)及其作品的研究方兴未艾。学者们往往把她看作是女权主义的先驱或者一个彻底的女权主义者。不可否认, 肖邦的众多作品呈现出 19 世纪美国女性不同程度的觉醒。但通过分析肖邦短篇小说中女性的命运与结局, 可以看出肖邦本人及其作品的女性意识具有一定的矛盾性: 她们经常在觉醒意识和传统意识中犹疑不定, 变化无常。另外, 被冠以女性主义作家的肖邦却在彰显进步的文本里隐藏着种族主义和父权主义的观点。

二、作品中的女人们

1899 年肖邦的长篇小说《觉醒》问世, 因其大胆描写性爱场面与女性对性的渴望, 在美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肖邦因此背负来自各方的指责, 遭遇被驱赶出作家协会的命运, 从此一蹶不振。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沉寂后, 她的作品终于在 20 世纪

60 年代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中, 被重新发现。其众多短篇小说也成为经典, 被世人反复解读。挪威评论家佩尔·塞耶斯特德借用女权主义的领袖波伏娃的用词, 将肖邦作品中的女性分为三种类型: 传统女性(feminine), 解放了的女性(emancipated)和现代女性(modern)^{[1]102}。笔者则依据肖邦短篇小说中女性人物的心路历程与结局, 把她们分为另外三类。第一类: 以死亡为结局的女人; 第二类: 曾经觉醒, 但最终回归传统婚姻的女人; 第三类: 体验或准备尝试婚外情的女人。

1. 第一类女人: 以死亡为结局的女人

肖邦的短篇小说《黛西蕾的婴孩》发表于 1893 年, 是被众多学者推崇的经典作品。作品讲述了美丽的姑娘黛西蕾的遭遇。黛西蕾是个弃儿, 婚后生了一个皮肤黝黑的孩子, 被丈夫质疑她有黑人血统。因不堪忍受猜忌与冷落, 她怀抱婴儿, 跳湖自杀。而丈夫却在整理他母亲的信件中发现, 自己带有黑人的血统。

众多学者认为肖邦控诉和鞭挞了残酷的黑奴

收稿日期: 2016-10-25

基金项目: 西安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多维视角下美国女性作家凯特·肖邦及其作品研究”(13XWB04); 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美国作家凯特·肖邦及其作品研究”(15JK160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新梅(1973-), 女, 西安外国语大学讲师, 文学硕士, 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及西方文艺理论; 张谡过(1967-), 女, 西安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大学英语教学, 英语国家研究及翻译理论与实践。Email:2278512264@qq.com

制度。然而,申丹女士却独辟蹊径地指出,《黛西蕾的婴孩》表面上是反男权压迫和种族压迫的进步作品,而实质上褒白贬黑,在潜藏文本中为白人奴隶制辩护^{[2]101}。就女性意识而言,黛西蕾从头至尾都是一个传统的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她对丈夫事事恭敬,处处小心。看到孩子的肤色,受到丈夫的冷落,她像一个犯错的孩子,只能以自杀来谢罪。肖邦为什么对待这位主人公如此残忍,让这个叫黛西蕾的女人死去呢?这与肖邦的自身经历密不可分。她自小生活在美国南方的富商家庭。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的时候,她只有10岁。她的家庭就有很多黑人奴隶,所以她和她的家人都支持奴隶制度,并且认为白人比黑人有很多的优越性。在这篇小说中,肖邦构建了一个黑白对立的社会,“在这一虚构的奴隶制社会里,白人温良慈爱,黑人残酷无情;白人尽职尽责,黑人不负责任”^{[2]105}。白人黛西蕾受到有黑人血统的丈夫的无情对待后,牺牲自我。小说借此更突出黑人的罪恶。肖邦种族主义的设计可谓用心良苦。

《一小时的故事》发表于1894年,讲述了患有心脏病的马拉德太太一小时内故事。在得知“丈夫出车祸丧生”的消息后,她由痛哭到逐渐安静,紧接着居然开始欣喜异常,喊出“自由了,终于自由了!”而当丈夫又突然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马太太突发心脏病死去。男权社会解读她死于“致命的欢心”。在小说中,肖邦安排了“丈夫死讯”这一突发事件,给没有强烈觉醒意识的马太太一个客观条件和契机。在完全被动的条件下,马太太逐渐意识到自我,并决定要冲破婚姻的牢笼,为自己而活。作为5岁失去父亲,31岁失去丈夫的肖邦来说,女性自立是必要的。然而就在马太太期盼全新生活到来的时候,肖邦又无情地复活了马先生,让马太太瞬间绝望。当然,肖邦用女主人公死亡的结局具有强烈反讽的效果,无情鞭挞了夫权社会。但也不难看出,为了让当时小说的审稿人能接受和发表这部作品,肖邦消减了女性意识的胜利,对夫权社会做了不小的让步。

2. 第二类女人:曾经觉醒,但最终回归传统婚姻的女人

肖邦三部短篇小说中的女性意识都是采取了先扬后抑的变化特点,即在小说的开始部分,女性

的自我意识觉醒,她们有的打算离婚,有的计划私奔,有的采取出逃的行动,但在小说结尾部分却都自愿重新回归家庭。作品中女性意识的矛盾性颇为突出。

《塞莱斯夫人离婚》写于1893年。因为丈夫常年不在家,也不承担家庭的支出,所以塞莱斯夫人在律师的引导和劝说下,逐渐下定决心离婚。可见,她自我独立、觉醒的意识逐渐增强。因为在19世纪的美国南方,离婚是被大众不耻不容的,塞夫人能下决心离婚,实属不易。然而,就在某天律师兴冲冲地去和塞莱斯夫人谈离婚事宜的时候,塞夫人却羞答答地说,她的丈夫回家了并承诺要与她好好生活,因此她不离婚了。仅仅几句所谓的承诺,就让这个女人彻底打消了离婚的念头。女性意识基本消失。

更具戏剧性的是《牛轭湖圣约翰女士》。小说中年轻的德莱尔夫人终日独守空房。于是决定和别的男人私奔。然而就在出发前,她得到丈夫战死沙场的消息,于是她毅然决定放弃私奔的计划,守着丈夫的遗像与衣物孤老终生。她是深陷道德和良心的桎梏中了吗?肖邦没有作更多的交代。只是寥寥数语,就让一个女人孤孤单单从年轻到年老,画面相当残酷。

《阿泰娜依斯》写于1895年。年轻姑娘阿泰娜依斯新婚仅仅两个月就从夫家出走两次,甚至与报社编辑产生情愫,但发现自己怀孕后,却热切地回到丈夫身边。可以说,阿泰娜依斯两次出走态度都极其坚决。第一次偷偷跑回娘家,无论父母、叔伯如何苦口婆心地劝说,她都拒绝回去。她反复强调“我讨厌当卡佐太太,我想做回阿泰娜依斯”。在她的自我意识中,独立的未婚姑娘的身份远远胜过当一个中产阶级的已婚女人。她“无法忍受天天和一个男人待在一起,自己的房间里挂着这个男人的外套和裤子,眼睁睁地看着他丑陋的光脚泡在她的泡脚盆里”。第二次出走是在兄弟的帮助下,她来到新奥尔良的旅馆,远离“烦恼的婚姻的束缚”,开启一段无拘无束新的人生。笔者佩服肖邦的设计,她多次描述新奥尔良的风景,让读者感受到女主人公崭新自我的觉醒。然而,就在离家四个星期的时候,阿泰娜依斯发现自己怀孕了。女主人公像变了一个人,她热切地给丈夫写信,急切地要坐车

回家，完全忽略了一直陪伴她的报社编辑，渴望投入到丈夫的怀抱。阿泰娜依斯一下子变成了贤妻良母。笔者认为阿泰娜依斯女性意识的矛盾性恰恰是肖邦女性意识矛盾性的体现。肖邦为什么赋予阿泰娜依斯女性传统意识的突然回归呢？

事实上，细读这部小说，笔者发现，尽管肖邦在表层文本中为阿泰娜依斯安排了两次出逃，但在潜藏文本中，肖邦从头至尾都是父权社会的代言人。在肖邦笔下，阿泰娜依斯一度是任性的，不成熟的，而丈夫则一直都是成熟的，容忍的，对待妻子宽宏大量的。妻子第一次离家出走，丈夫主动上门去接，没有苛责的话，只是平静地说：“阿泰娜依斯，还没准备好了吗？天晚了，没时间耽搁了”。而面对妻子第二次离家出走，他在信中表示：他要等待她成长，心甘情愿地回家来。直到小说最后，阿泰娜依斯怀孕后，幡然醒悟，回归家庭。换句话说，肖邦始终认为阿泰娜依斯所谓的追求独立实际上是不成熟的表现，而自愿回归家庭才是成熟的、正确的。

3. 第三类女人：体验或准备尝试婚外情的女人

在肖邦的女性人物图谱中，《一个正派女人》中的巴罗达夫人和《暴风雨》中的卡里克斯塔是极具魅力的女性角色，无疑得到肖邦更多的推崇与厚爱。

《一个正派女人》写于1894年。巴罗达夫人起初不满丈夫的朋友古沃奈尔来家里做客，后来却鬼使神差地爱上了这位不速之客，在黑夜的庇护下，她甚至冲动地想要去抚摸他的脸庞。为了避免类似的冲动再次发生，作为一个正派女人，巴罗达夫人逃离了。之后，她拒绝丈夫再次邀请古沃奈尔来做客。直到一天，她主动提出邀请古沃奈尔来家做客，并对丈夫直陈：“我已经克服了一切！等着看吧。这次我一定会对他非常好的”。一个开放的结局，增添了无尽的可能性。语言的模糊性与暧昧性引发读者解读上的争论。巴罗达夫人到底克服了什么？是克服了道德的羁绊走向人性的自由，还是克服欲望回归“正派”女人之列？^{[3]106}换句话说作为一个正派女人，如果她已经击败了自己的欲望，可以掌控自己的冲动，那么她会坚持做一名贤妻。但如果她已经做好迎接婚外情的准备，那么迎接她的就是出轨的刺激与快乐。在肖邦的描述中，巴罗达夫人确实曾是个正派女人，在情欲突起的时候，

为了保全道德良知，她明智地选择“眼不见，心不烦”的逃离模式。然而在小说结尾，当她主动提出邀请古沃奈尔来家做客，并大笑着对丈夫说她已经克服了一切的时候，却暗含了对世俗婚姻的挑战，对道德传统的颠覆，对婚外情的期待。

《暴风雨》写于1898年。已为人妻的卡里克斯塔在暴风雨中与以前的恋人享受鱼水之欢，而在丈夫和儿子归来后又重返贤妻良母的角色。众所周知，19世纪“家中天使”仍然是美国社会对女性的角色定位，女性是不能有性的愿望的，她的任务只是满足男性的需求。

而肖邦却大胆地书写婚外情，并用欣赏的眼光，激情的笔触，描绘性爱的愉悦场面，释放自然人性和欲望。她确实是一个勇敢超前的作家。更有趣的是，暴风雨中的这段婚外情居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卡里克斯塔一改往日的苛责变成温柔的妻子，偷情的男人成了体贴的丈夫给妻子写信，而收到家书的妻子为能暂时摆脱家庭的束缚，享受偷闲的自由生活而窃喜。总之，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肖邦挑战和颠覆了19世纪美国父权社会的伦理道德，确实刮起了一阵急促的暴风雨。当然，小说最后卡里克斯塔在丈夫和儿子归来后又重返贤妻良母的角色，可以看成是肖邦女性意识的矛盾策略，因为肖邦毕竟还要在这个社会继续生存下去，她不能不考虑社会现实的限制。由于随后《觉醒》的出版招致整个社会对她的口诛笔伐，肖邦面临人生与写作的双重困境。最终肖邦放弃在有生之年发表《暴风雨》。

三、肖邦为何如此矛盾

《故事》中说：“把人物逼向越来越困难的两难之境，迫使她们做出越来越艰难的冒险抉择和行动，逐渐揭示出其真实本性，甚至直逼无意识的自我。”^{[4]104}人物性格真相在人处于压力之下做出选择时得到揭示^{[4]99}。肖邦笔下的女性往往就是在这样的两难之境中做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而前后选择的不同彰显主人公和肖邦本人女性意识的矛盾性。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肖邦短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经常在觉醒意识和传统意识中犹疑不定，变化无常。女人们选择的阶段性命运与

最终的命运往往大相径庭。而这种矛盾性与肖邦本人女性意识的矛盾性密不可分。笔者下面就从肖邦的血统、个性、19世纪美国的女权运动以及肖邦的写作习惯等方面来探究这个问题。

1. 法裔克里奥尔人的血统

肖邦5岁丧父,与寡居的曾祖母、祖母和母亲一起生活在美国南方圣路易斯。肖邦具有法裔克里奥尔人的血统。从小她就听长辈讲克里奥尔人的故事,而她以后的作品也多描写克里奥尔人。克里奥尔人是“一个独特的群体,因其有色人种的血统无法为白人社会所接受,又因肤色的差别和阶级优势被黑人群体所憎恨。在种族二元性的美国社会,对于种族、社会身份认同的模棱两可将克里奥尔人抛向了一个尴尬的窘境,处在夹缝中的身份困境成为萦绕在历代作家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梦魇”^{[5]36}。克里奥尔民族文化身份的复杂性使得肖邦立场摇摆不定^{[5]37},女性意识的矛盾性突显。

2. 个性独特的肖邦

与个性好强的妈妈、祖母、外祖母一起生活,凯特·肖邦并未体会到19世纪约定俗成的女性定位,没有成为一个“家中的天使”。凯特嫁给了法裔克里奥尔人奥斯卡·肖邦,婚后,她继续保持这独立的个性,做了许多当时不符合传统女性规矩的事情。她曾在蜜月日记中记录了丈夫睡午觉,她独自散步的经历。“我到底走了有多远……我想知道人们会怎么看待我——一个年轻女人独自散步。我甚至在湖边的一个小啤酒园喝了杯啤酒”^{[1]34}。除了坚持独自散步,肖邦后来又爱上了骑马,她也经常吸烟。而这些行为都与19世纪中产阶级传统女性的形象格格不入。当时,妇女行动的自由仍旧受到严重的限制。因此,肖邦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女人,带有反传统的一面。

肖邦也是一个孤独而矛盾的人。小说集《牛轭湖的乡亲》出版后,肖邦名声鹊起,但她在1894年5月22日的日记中却表达了自己的孤独与痛苦。“假如我的丈夫和母亲能够复活,我觉得自己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他们去世后进入我的生活的所有东西,与他们的生存重新结合在一起”^{[1]59}。“对于周围的人来说,凯特·肖邦是个谜。她始终与人保持距离与私密性”^{[1]71}。艾米丽·托斯也指出肖邦是一个

孤独的先行者^{[6]xix}。

3. 美国女权运动的兴起

父权社会规定传统女性的特质,并长期进行思想统治,他们提出“真女性”应该具备四大优点:虔诚、贞洁、温顺和持家。然而随着美国女权运动兴起19世纪末出现“新女性”的观念。新女性挑战了传统文化关于恋爱、婚姻和家庭的世俗观念,拒绝把养儿育女视为妇女的最高职责。新女性文学描绘渴望自由和独立的已婚妇女,包括女性性解放和在婚姻内外选择性伙伴的权利^{[7]336}。如火如荼的女性解放运动不可能不影响到肖邦的人生态度与创作态度。

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美国出现了大批女性社团,1890年至1892年肖邦也曾加入圣路易斯周三女性俱乐部,但后来又主动退出。肖邦“承袭了克里奥尔人和南方文化的保守性,从来没有公开支持过妇女解放运动,甚至在一些作品中对女性社团进行了辛辣的讽刺”^[8]。“凯特·肖邦从来都不是字典定义里的一位女权主义者。也就是说,她从来没有加入或支持过任何类似组织,通过它们为妇女努力争取和男人同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1]102}。

4. 肖邦的写作习惯

佩尔·塞耶斯特德曾指出肖邦创作过程中一个有趣的现象。“肖邦同时关注传统女性和解放了的女性。她常常创造出成对的截然相反的女性形象,就在几周的时间里,先写传统女性,紧接着就写解放了的女性,而这表明,就女性的命运而言,肖邦一直和自己保持着对话。”^{[1]114}因此,在肖邦的作品中就出现了“天使”与“魔鬼”的较量,“玛利亚”与“夏娃”的对立,“真女性”与“新女性”的较量与交替。

肖邦在矛盾中成长,她笔下的主人公也是如此。终于在《暴风雨》中,肖邦突破传统女性的性爱观,描述激烈而愉悦的性爱场面。肖邦对整个事件的描述表达出欣赏、赞美的态度,充分表明对女性自我追求的肯定。

四、结 语

肖邦在19世纪的美国南方成长,她笔下的女性也在变化、成长。她描述女性的生活状态,探索

女性的心路历程。一方面,肖邦是一个超前的作家,小说涉及女性的自由、觉醒、反抗、婚外情、性渴望等内容,逾越19世纪传统女性的形象。但另一方面她毕竟受到个人经历与社会现实的影响与制约,因此肖邦短篇小说中女性意识的矛盾性显著,女人们常在不同的选择中犹疑,矛盾重重。肖邦并未给女人们指明好的出路,但她描写、理解和同情着小说中的女人们。

正如学者金莉指出的,肖邦研究“如今正朝着更加深入广阔的方向发展”,100年前的作品,仍旧“以其强烈的震撼意义和不可魅力吸引着今天的读者”^{[7]403}。

参 考 文 献

[1] PER S. Kate Chopin: A Critical Biography[M].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P, 1969.

- [2] 申丹. 隐含作者、叙事结构与潜藏文本: 解读肖邦《黛西蕾的婴孩》的深层意义[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5): 100-109.
- [3] 陈戡. 凯特·肖邦女性观的矛盾发展: 从《一个正派的女人》到《暴风雨》[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5): 105-107.
- [4] 麦基. 故事: 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M]. 周铁东, 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6.
- [5] 张晓敏. 凯特·肖班《觉醒》中克里奥尔民族身份认同问题研究[J]. 吉林师大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2): 36-38.
- [6] EMILY T. Unveiling Kate Chopin [M].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9.
- [7] 金莉. 文学女性与女性文学: 19世纪美国女性小说家及作品[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 [8] 张锐. 双面肖邦: 重复与逻辑悖谬[J]. 名作欣赏, 2011(1): 50-52.

The Contradictoriness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Kate Chopin's Works

LI Xin-mei¹, ZHANG Su-guo²

(1. School for Candidates to Study Overseas,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061, China;

2. Department of General Studies,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China)

Abstract: Due to her bold writing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awakening, American writer Kate Chopin is widely acknowledged as a pioneer in the 19th century feminist movement. However, by analyzing the fates and endings of the female protagonists in her short stories, the paper finds that Chopin's works are full of contradictoriness in terms of feminist consciousness, for the heroines often fluctuate between the awakening consciousness and the traditional assumptions, thus a tot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choices of fate and their final destinies. The contradictoriness is fully explored based on the close analyses of three heroine types in her seven short stories, *Désirée's Baby*, *Athénaïse*, *The Storm* and so on: the one who dies in the end, the one who once awakens but eventually returns to traditional marriage and the one who has experienced an extramarital life or is ready to do so. Such a mentality is a natural product of the family origin, the unique personality, the feminist thoughts and the writing habits of the writer. In addition, some of her works, which have been considered as writings in progress ever since, are even embedded with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paternalism.

Key words: Kate Chopin; female consciousness; contradictoriness

【编辑 程广平】